

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学术特征及其生成逻辑^{〔*〕}

张意忠

(江西师范大学 教育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回望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作为该时代的学术精英,他们主要来源于废除科举后的士人、海外留学的归国人员及高校优秀毕业生。他们在治学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征:学术旨趣——经世致用、学术为本,学术素养——学问渊博、中西贯通,学术方法——融汇中西、各有特点,学术成就——创建学科、取得成果。其学术特征的生成在于教授追求学术、担当责任,大学提供健全的教授制度、赋予教授学术自由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历史启示我们,需要提高教授素养,完善教授制度,营造宽松环境,只有这样,才可能提高教授学术水平。

〔关键词〕民国教授;学术特征;生成逻辑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06.017

“西学东渐”催生了中国大学的建立,为大学教授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912年大学教授制度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教授制度开始与西方大学接轨。回望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学术研究,他们引进西学、中西汇合、创建学科、建立规范、取得成就,促进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形成了特有的学术特征。这是教授自身、大学教授制度及社会环境综合作用而生成的结果。

一、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主要来源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是该时代的学术精英群体,数量少、水平高。他们主要来源于传统士人、留学归国人员及高校优秀毕业生,来源的多样化及教授聘任的严格标准,保障了教授的学术

水平。

(一)废除科举后的士人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学习是为了进入仕途,光宗耀祖。但是,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它的废除,切断了学与仕之间的关系。而当时西方高等教育制度的引进、大学的创办,正好为这些士人提供了栖身之地,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理想场所。对于传统士人而言,随着仕途的突然中断,他们不再限于举业和功名,而是选择教师作为职业,专心研习学问。许纪霖认为,“儒家追求了两千年的学统,到了20世纪终于找到了学校这一肉身,精神的灵魂终于获得了安身立命之地。”^{〔1〕}有的还因官场黑暗而转行做教授,

作者简介:张意忠,教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师教育及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民国大学教授群体特征研究”(19JY01)的阶段性成果。

如,1917年梁启超辞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职务,后来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教学和学术中。^[2]总之,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一部分是由士人转化而来,他们脱离官场、商场,从政治人转变为学术人,由传统的士大夫转变为教授。

(二)海外留学的归国人员

随着民国时期大学数量的增加,高校师资短缺,因而聘请留学归国人员成了缓解教师短缺的有效举措。他们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又熟悉传统文化,学贯中西,是大学教师的理想人选。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中很多都有过出国留学经历,这也是他们事业发展的捷径,正如胡适所言:“今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3]民国实行学术开放政策,出台相关制度,鼓励出国留学,有效地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发展。蔡元培曾提出:“当教育初兴、学术幼稚之时,欲造宏博之人才,为强国之基础,则派生留学尚矣。”^[4]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后受到重视,他们也愿意回国服务。据相关档案显示,教师是当时留学归国人员最想从事的职业,其次是工业及其他行业。民国时期留学生学成后回国到大学任教的比例很高,“高等教育界之人员亦十分之九以上为留学生。”^[5]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批学者先后留学日本,如范源濂、宋教仁、陈宝泉、高步瀛等,出现了一个留学日本的高潮。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留学热潮,留学欧美日人数大量增加,如蒋梦麟、陶行知、胡适、郭秉文、吴宓等,他们回国后就职于高校。据费正清的初略统计,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在其200名受过国外高等教育的教师队伍中,有170余名是教授。^[6]由于受西方教育思想影响,他们要求改革国内教育现状,引进西方学科体系和规范。

(三)高校优秀毕业生

在民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高等教育逐步发展壮大,急需扩充教师队伍。在此背景下,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纷纷选拔高校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之后进行培养。云南大学校

长熊庆来从毕业生中择优聘任教师,仅抗战胜利后,他从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中,就选聘了20多位优秀人才,他们后来大都成为知名教授。^[7]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系的助教几乎都是本校留校的毕业生。1933年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聘任的10名助教,均为国立大学的毕业生。^[8]唐文治重视从毕业生中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如王遽常、唐景升、蒋庭曜、王震、何葆恩、钱仲联等,^[9]然后择优选派到国外学习。在14年的时间里,他先后送出了200多人到国外留学,后来他们大都成为学校的中坚力量。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延聘一些国内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如吴大猷、吴大业、吴大任、殷宏章、李锐等,他们很快便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成绩。^[10]这些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后,经过培养,大都逐渐成长为教授,这也是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主要来源。

此外,还有少部分文化程度不高、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如梁漱溟、沈从文、郭绍虞、华罗庚等,由于他们学有专长、水平很高而成为大学教师,后来被聘任为教授。

二、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学术特征

(一)学术旨趣:经世致用,学术为本

一是经世致用。这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传统。我国知识分子历来都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大多坚守着学术致用的价值取向,将学术作为拯救世道人心的根本途径。在他们看来,学以致用是学科产生、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其学说没有“用”,学科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郭秉文认为,学者再也不能一味地脱离现实谈经论道,而是要“所学者皆有所用,所用者皆本所学”,学以致用,学用一致,用其所学。^[11]钱穆认为,治学志在明道救世,“以事业为其学问之中心者,此即所谓‘学以致用’。人之本身,必然期有用。吾人之所以从事于学、学为人,其主要动机及其终极意义,乃对社会人群有用、有贡献”。^[12]

1919年“新文化运动”后,一些教授提出了“学术救国”口号,希望通过学术破除封建迷信,启发国民心智,解决社会问题,拯救国家。1936年,任鸿隽倡言“科学是立国的根本”,并且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当时许多教授都认为,科学是国家富强的关键,没有科学的竞争,国家难以图存。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一些教授强调“学术救国”,重视学以致用。即使一些过去强调“为学问而学问”的教授,其治学态度也发生转变,开始关注现实问题。作为书生的王国维,将学术与家国存亡相联系。俞平伯给胡适写信说:“今日之事,人人皆当毅然以救国自任,吾辈之业唯笔与舌,真欲荷戈出塞,又岂可得乎!”^[13]陈垣一改原有的学术风格:“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14]教授通过创办刊物,服务社会,让中国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以达到救亡目的,成为“致用”的学问。中央大学教授正是出于“书生报国”的责任,创办了《时代公论》。^[15]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将学术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基于社会需要开展研究,将学以致用落到实处。

二是学术为本。与西方追求学问、寻找智慧、不问是非的学术旨趣不同,中国强调的是学以致用。但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学术引入中国,引起了学者对学问本身的追求。正如顾颉刚所言:“我们这班人,受了西方传来的科学教育,激起我们对于学问的认识,再也耐不住不用求真知的精神,在中国建设一个学术社会了。”^[16]他认为建立学术社会是自己职责所在。一些教授以学术为业,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要义,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以学问本身作为目的。冯友兰曾说:“为什么研究学术?一不是为了做官,二不是为了发财,为的是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17]王国维认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18]在他看来,治学是“求知”,是以求真理为宗旨,而不是“求用”,治学“不为利来,不为利往”,否则学术

就不能发达。顾毓琇认为:“科学并不能救中国”,因为“科学的目的是为知识,科学的任务是求真理……从前利用科学去达到坚甲利兵的情绪,终于为四千年来重知识爱真理的理智压服了。我们将要为科学而研究科学。”^[19]前文提到的梁启超退出政坛,追求学问,也是对学术为本的诠释。总之,民国时期的一些大学教授以学术本身为目的,追求真理,摆脱名利的诱惑,静心研究,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当然,经世致用与学术为本两者并不矛盾,可以有机结合,而且在一些教授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们在强调学术致用的同时,严守学术标准;重视求真基础上的致用,以防主观判断,失去致用效果;在为学术而学术的同时,强调经世价值,两者相辅相成。胡适、傅斯年等既强调学术为本,又注重学术的社会价值,发挥学术启迪民智的作用。求真与致用贯穿于胡适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并且相得益彰。

(二)学术素养:学问渊博,中西贯通

一是学问渊博。按照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的观点,“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大师,每一代人都都有学问。”^[20]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无疑是该时代渊博学问的代表。前文的教授来源分析表明,他们是知识精英,很多都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熟悉中国传统的诸子百家之学,涉猎多学科领域,功底深厚,是各个学科领域的代表人物。王国维对甲骨文、金文、古文字、考古学及文学、美学、哲学等均有独到的见解。陈寅恪通晓文学、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字学、人类学、校勘学。胡适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21]沈士远熟悉周秦诸子、汉代考据、汉代经学、宋明理学与清代朴学,被称为“沈天下”。刘文典博古通今,通晓秦、两汉、唐、宋、元、明、清到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史。黄侃在史、集、经、儒、玄、子等领域有很深的造诣,考据、义理与词章,烂熟于心。还有一些教授文理渗透,相互促进。赵元任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但他在数学、物理学和音乐方面同样

很有成就,是物理学家、数学家、中国现代音乐学的先驱,在哲学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顾毓琇是电机与无线电方面的专家,也是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佛学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数学教授郑桐荪,于文史诗词书法国画无所不窥,对历史、地理知识特别精通。马君武通晓自然科学,他还在政治学、哲学、史学与经济学领域有所建树。当然,也存在个别教授不学无术、水平低下、滥竽充数的状况。

二是中西贯通。民国时期的许多大学教授都有过海外留学经历,他们旧学根底扎实,又接受西方教育,学贯中西。中西杂糅、新旧并存是民国时期许多大学教授的共同特点。“那个时代的教授,其学养的深厚与道德的示范是后人难以企及的。”^[22] 陈寅恪家学渊源,精于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还精通拉丁、希腊、英、法、德等国外 10 余种语言文字,“其掌握语言之赡富,不惟当代一人,简直古今无有。”^[23] 吴宓曾评价他:“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24] 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多国语言,掌握西方科学、语言和东方知识,最早将《论语》《中庸》翻译为英文、德文传播到西方。林语堂评价他:“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25] 吴宓精通英、法、德语及西方文学,研究古希腊罗马历史文化、古代文学,功底深厚。钱锺书学识渊博,精通英语、德语、拉丁语。赵元任作为语言学家,具有语言天赋,精通英文、德文、法文等多国语言。刘文典是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熟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汤用彤在中、西、印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金岳霖、贺麟与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用英文讲授西方哲学。总之,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大都学问渊博,功底深厚,是讲课的学问家。

(三) 学术方法:融汇中西,各有特点

1. 融汇中西

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中西交汇、渗透融

合,带来了学术新视野,催生了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成为教授治学方法的主流。

一是实证主义方法。“实证方法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领域渗透的结果,是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主体方法。……经由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的介绍,这一方法在民国学术界得到了广泛传播,影响及于每一学人。”^[26] 实证主义代表人物杜威、罗素等先后来华讲学,有关实证主义方法的相关著作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推动了实证主义的发展。胡适作为杜威的学生,受其影响,他把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哲学、文学、教育和历史等多学科的研究之中,“首次将西方实验主义方法与传统的训诂学、校勘学和考据学的治学精神相结合,在我国方法论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块新界石。”^[27] 开启了中国学术史上实证主义的思潮,建立了新的研究范式。王国维、陈寅恪将实证方法与传统考据方法相结合,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创新。王国维主张学习西方分析综合的方法,既要实证分析,又要理论概括,他通过中西之学,发明了“二重证据法”,被称为实证主义史学的领导人物。冯友兰用它来解释中国的哲学和宋明理学,利用实证方法阐述理与气、真际与实际、共相与殊向,建构了“程朱新理学”体系。金岳霖从实证主义哲学出发,通过吸收、融合与创新,建构了本体论、认识论与逻辑论的学术体系,呈现出中西融合的特色。总之,实证主义方法引进之后,在教授中得到广泛应用,促进了学术发展。

二是逻辑分析法。对于西方逻辑学引入中国,冯友兰指出,逻辑方法的传入是“真正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28] 他运用逻辑分析法,建构形而上体系,其著作《新理学》就是通过逻辑方法来论证中国哲学。金岳霖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研究哲学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法,每个概念、命题都应该明确、清晰,需要细致深邃的分析,严密推理,合理论证,不能含糊其辞。他的专著《论道》通过下定义、

演绎推理等逻辑分析法建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体系完整,说理圆融,思想深邃,是逻辑分析法应用的结果。张岱年运用逻辑分析法,以问题为纲,研究中国哲学史,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张申府把逻辑解析作为哲学的一个基本界说。“他们积极引进西方现代逻辑和逻辑分析方法,并贯彻于自己的哲学研究之中。”^[29] 他还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翻译成了中文版。可见逻辑分析法在教授中得到推广应用,产出了一批学术成果。

三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被大量引进。“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以其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在民国学术领域异军突起,一枝独秀,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并对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30] 一批教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撰写了一些书目,推动了思想的传播。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被教授广泛地运用到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等各个领域,成为著书立说的重要工具。胡适整理国故,强调运用科学方法整理传统文化,尊重事实,重视证据。他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循序渐进地做学问。此外,茅以升主张“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止,持之以恒”的学术研究方法。张岱年强调治学要处理好“读书与思考的关系、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思想与生活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31] 黄侃的学问之道要求:不欺人、不知者不道、不背所本、为后世负责、不窃,“师古而不为所囿,趋新而不失其规”。这些治学方法都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表明教授治学受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影响,它为教授建立学术范式发挥了应用的作用。当然,在使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时,存在忽视中国特点,简单、机械地套用的问题,有教条主义倾向。

四是直觉法。民国时期的学术经过进化和科学实证主义的渲染,西方非理性直觉主义思想逐步传入中国,与其固有的思维方法相融合,

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直觉思维方法,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可,“从而使传统学术焕发出崭新的生机和活力。”^[32] 王国维翻译的《哲学概论》对直觉法进行了详细的解说。1922年,《民铎》杂志出版了《柏格森号》,发表了冯友兰的《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张东荪的《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判》等。梁漱溟认同柏格森的直觉法,并在此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借鉴与创新,将其作为区分科学与哲学的工具。梁漱溟、张君勱用它来解释中国的道德哲学,认识到哲学方法不同于科学方法,不仅需要逻辑的分析,更需要社会的、历史的分析。^[33] 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对中西直觉方法的继承、批判、融合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国学术的不断发展。总之,随着直觉法的引进、吸收与扬弃,激发了教授的学术活力,逐步成为他们治学的主要方法。

2. 各有特点

随着西学的兴起,中国传统的“师门”“家法”的研究范式难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一些教授在应用“科学方法”的过程中,基于不同的学术流派,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研究范式。例如,对于哲学研究,教授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治学风格,有着各自的发展脉络。清华大学教授专注于研究哲学问题,而不问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应该如何解决;北京大学教授则研究中西哲学史,而且每位教授对自己的研究都有相应的认知。“金岳霖是主张新实在论的,冯友兰先生有‘新理学’,贺麟先生则有‘新心学’,洪谦先生属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34] 同是研究传统经典《周易》,从不同的角度入手所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沈有鼎从逻辑学的角度切入,闻一多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它视为“钩稽古代社会史料”的文献来看待。^[35] 王喜旺认为西南联大教授在研究路径上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36] 雷海宗和钱穆开展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激励民众起来奋发抗战”,但在实施路径上各不相同。雷海宗从西学思想中寻找激励人心的力量,拿西方文化形态

学解释现实问题；而钱穆“走的是回归传统的路子”，他从梳理中国历史发展的状况着手，寻找文化再生的力量。钱穆认为中国治学与西方不同，西方是按照学科分类进行研究，互不关联，中国是分门不别类。他提倡从大处着手，“心胸识趣较可盘旋，庶使活泼不落狭小”。^[37]由此可见，教授们即使是针对同一问题的研究，在路径上也各有千秋，呈现出各自的特点。此外，一些大学教授整合多种方法，达到治学的新高度，如：陈寅恪使用实证方法与义理阐释法结合，冯友兰用逻辑实证法与直觉法结合，侯外庐将考据法与唯物辩证法结合开展学术研究，呈现出多种方法融合的状况，进入了治学的新境界。总之，教授治学是基于各自流派及自身特点，选择治学方法，因人而异，各具特色，促进了学术的百花齐放。

(四) 学术成就：创建学科，取得成果

一是开拓学术领域。上述学术方法的应用，学术范式的建立，促使教授创立了新的学科。就中国的传统学科而言，教授对传统的文史学科强调摆脱儒学的桎梏，放弃长期存在的汉宋儒学之争，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化，促进了学科发展。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将康德、尼采、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及禄尔克的心理学合在一起，在比较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中方的境界说，开创了中国词话史上的新纪元，他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38]陈寅恪将清代乾嘉学派重证据和事实与西学的“历史演进法”相结合，根据挖掘史实发展变化来研究史料，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此外，他还开辟了不同民族语言与历史比较研究的新领域。汤用彤用“玄学”来概括哲学文化，对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改变了重佛学轻玄学的风气，构建了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独立学科。金岳霖的《知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构了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他还是近代逻辑研究的开创者。王力通过运用中外比较的方法，突破西方传统理论，建立了具有中国汉语特色的语法体系。吴宓为中国开创了世界

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创建了比较文学学科。王非曼从事家政学研究，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范式，促进了家政学学科的发展。吴文藻、费孝通、雷洁琼等教授创立并促进了社会学学科的发展。黄维廉对图书馆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总之，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诸多教授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创建并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学术发展的历史表明，随着西学的引进，民国大学得到创建和发展，也促进了学科的建立。教授作为大学里学术职务最高的教师，担当了开拓学科的重任，创建了新学科。

在自然科学领域，教授借鉴西方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同样创建了新学科，特别是许多曾经留学海外的教授先后在中国创建了数学、物理、生物、地学、化工、建筑与电机工程等学科与学系，并成为该学科的开创者。例如，何育杰创建了物理系，姜立夫创建了数学系，竺可桢创办了地学系，庄前鼎创建了机械工程系，顾毓琇创建了电机工程系，苏步青是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吴有训是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刘恩兰开创了海洋地理学的新领域，严济慈是现代物理学与光学仪器工业研究的开创者，朱元鼎是鱼类学的开创者，周如松是金属晶体研究领域的奠基者，严彩韵是营养学研究领域的开创者，胡刚复是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丁文江与翁文灏创建了地质学，茅以升创建了桥梁工程学，侯光炯是农业土壤学的开拓者，陈翠贞是国内儿科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胡先骕与秉志是植物分类学的创始人，杨崇瑞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创始人并创办了国内第一所助产学校，王淑贞创建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妇科——西门妇孺医院妇科。当然，对于西学的引进，刚开始主要还是局限于翻译与模仿，不免有些粗浅。

二是取得学术成果。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受西学熏陶，在建立新范式、创建新学科的过程中，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正如葛剑雄所言，民国学术在“各个学科几乎都产生了奠基者和创始人，并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大

师”。^[39]在中国传统人文社会学科领域,教授们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取得了新成就。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观堂集林》等被公认为是新学术的开拓者、奠基者,他还在敦煌学、甲骨学、考古学、教育学与简牍学等领域取得了学术成就。郭沫若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40]梁启超在文学、目录学等学科领域成就突出,其主要作品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刘文典是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专注于研究庄子,研究成果丰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被称为是范式性的变革,其《文学改良刍议》被称之为“中国文化革命之父”。他还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自由主义、大同主义和乐观主义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黄侃在文字、训诂、音韵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钱锺书的《围城》出版后受到追捧,一版再版,一时洛阳纸贵。辜鸿铭是西方诗歌翻译的先驱者,其代表作《中国人的精神》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被称为是史学界释古派的扛鼎之作和“划时代的巨著”。闻一多涉足古代文学、诗歌创作、文艺评论、美术与文化研究等领域,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此外,以陶行知为首的一批教育家提出了一系列教育理论,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等,促进了教育改革和发展。

在自然科学领域,教授在创建中国学科体系的同时,也取得了学术成就。胡先骕首次创立了“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和被子植物亲缘关系系统图,发现水杉科植物化石,在植物区系学、古植物学和经济植物学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吴有训发现光子有动量和能量,发展了多原子气体散线 X 射线的普遍理论。严济慈在压电晶体学、光谱学、地球物理学以及压力对照相乳胶感光性能的影响等学科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苏步青在仿射微分几何、射影微分几何、一

般空间微分几何及射影共轭网概论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创建了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发展了“K 展空间”理论。陈翠贞发现了用氨苯磺胺治疗儿童急性菌痢的方法。王淑贞对子宫癌、子宫内膜癌、输卵管癌等疾病的治疗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妇女健康作出了贡献。杨崇瑞最早提出“节育优生”,在妇幼保健工作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纵观民国大学的学术成就,不论是学科发展,还是学术成果,都是以教授为主体,在教授的引领下取得的。

三、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学术特征的生成逻辑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所呈现的上述学术特征,是教授、大学与社会共同作用、逐步生成的。其学术特征的生成逻辑始于教授自身对于学术的执着追求。教授作为治学的主体,其渊博学问保障了治学水平。他们在西学的引进过程中,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学术研究,创建学科。同时,学术研究具有自身的特点,不仅需要物质条件,更需要保障教授心无旁骛、自由自在地开展研究,因此,需要大学提供制度保障,社会提供宽松的环境与氛围。正是由于教授、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教授学术特征的生成。

(一)教授的使命担当

一是追求学术。尽管民国社会动荡不安,办学条件不足,但大学教授并没有放弃对学术的追求。即使是在抗战时期,校址多次迁移,教授生存困难,但他们也没有放弃追求,反而培养了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增强了事业心和责任感。许多教授做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高官厚禄,追求名利,而是找准自己的定位,怀着教育救国和学术救国的理想信念,追求真理,献身学术。胡适、程俊英、闻一多等都放弃了从政的机会,专心从事教师职业。李相显闭门专心撰写《朱子哲学》,家院被日寇火烧也不忍离去。共同的学术使命和信念成就了教授。正如姜亮夫所言:“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

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41]

二是担当责任。民国时期列强入侵,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但大学教授却秉持了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优良传统,对国家社稷的未来深表忧虑,因而寄希望于教育救国、学术救国,这是他们的学术理想与社会责任。因此,他们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致力于学术研究,体现出强烈的学术使命和社会良知。他们想通过自己的知识来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家,因而以学术为志业,献身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哪怕是在艰苦的抗战时期,大学教授认为自己不能上前线,在后方就要努力培养人才,加强科学研究,通过智力劳动报效祖国。正如贺麟所言,为了完成“学术建国”的神圣使命,需要各自领域的代表人物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42]

(二)教授制度保障

一是健全教授制度。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制度的建立,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影响下,积极学习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也是保障教授形成学术特征的关键。教授制度主要包括教授的聘任标准与程序、教授服务与待遇规程、教授休假制度、教授治校制度等,为教授的工作与生活提供保障,使其静心研究,不必为生活操劳。随着大学的发展,教授制度逐步完善,更加规范与全面。如,1941年为了奖励学术优秀的教授,设立了“部聘教授”和“校聘教授”,丰富了教授制度,使教授有了更高的奋斗目标。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制度不仅弥补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空白,也保障了教授的权力、待遇与声誉,使之安心向学,提升学术水平。

二是赋予学术自由。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制度的实施,赋予了教授学术权力,彰显了学术自由。教授可以自主决定学术事务,避免受到党政

干预,调动了教授的积极性,营造了比较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没有考核要求,可以自由流动,只要有真才实学,就会有用武之地,这让他们不必依赖组织和个人而生存,保持了学者的纯真,坚守了学者的良知。此外,还重视学术交流,提供学术交流平台,邀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如杜威、罗素、克伯屈、麦柯尔等,活跃了学术氛围,激发了学术热情,促进了学术发展。

(三)社会环境熏陶

一是政治经济的影响。民国时期战乱纷飞,新旧时代交替,社会不断分化整合,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教授反而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即使受到干预、限制,教授也会据理力争。如,国民党曾要求统一高校教材、学院院长加入国民党,但在教授的反对下,最后也不了了之。此外,蔡元培、胡适、贺麟等一批学者倡导教育独立于政治,实行政教分离,并据理力争。许多教授不参与任何政治党派,保障了学术领域的相对独立。另外,民国时期尽管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生活艰苦,但教授的薪水却很高(抗战时期除外),他们衣食无忧,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

二是文化环境的熏陶。民国是新旧之学、古今之学、文理之学相互整合、调适与创新的时期,制度的转型、思想的解放,推动了文化上中西融合、百家争鸣的局面。随着一大批有留学经历的教授任职于高校,学科设置、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等均受西方大学影响,与国际接轨,建立了相应的现代教育体系与学术道德规范框架,为教授遵守学术道德、承担学术责任提供了蓝本。1919年的“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促进了教授思想文化的变革,他们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学术独立。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最好的注脚。当时出国留学成为热潮,回国后他们着手传播西方文化,呈现出学术多元、文化繁荣的景象,为教授治学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四、思考启示

(一) 提高教授素养

一是崇尚学术,提升学术水平。民国教授在社会动乱的环境下,面临各种压力和诱惑,仍然以学术为业,热爱学术。他们为了追求真理,坚定不移,坚贞不屈,排除外来压力,用梁启超的话说,学问本身就是目的,他们视学问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反观当前的一些教授,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名利,他们缺乏积淀,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甚至学术不端。对此,教授对学术应有敬畏之心,崇尚科学,追求学问,把学术作为目的,而不是获取功名的手段,力戒浮躁,安心向学,日积月累,自然会学有所成。

二是培养人格,遵守学术道德。学术是有尊严、有地位的,教授需要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对待学术,摆脱金钱与权力的诱惑,确保学术研究、学术思想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如果人格不独立,思想不自由,就像身体没有灵魂,做学问找不到方向。教授只有培养独立人格,才能做到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被偏见所玷污,不为名利所左右,不为世俗所迷惑。学术研究有自身的规范。教授要身体力行,洁身自律,不剽窃、不抄袭,承担学术责任,遵守学术道德,在学术共同体中起示范引领作用。

(二) 完善教授制度

一是改革教授聘任制度。现在教授聘任都有着一套严格的标准与程序,看似合理,实则刚性有余,弹性不足。学历不够,非名校毕业,不管如何优秀,都难以跨入重点高校的门槛;聘任条件根据成果数量与等级,对真实水平的考核力度不够。民国时期的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聘请教授实施兼容并包,唯才是举,没有学历、学位,但水平很高、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也能被聘为教授。学历与资历不能完全体现学者的真实水平,两者之间不能画等号,教授聘任要重视实际水平与发展潜力的考核,不能完全按照条条框框去套,否则,一些偏才、怪才很难符合聘任条件;要注意学

科差异,制定不同的选拔标准,防止整齐划一的选拔要求。

二是创新教授考核制度。目前,许多高校对教授有年度考核、聘期考核等,考核时间短,量化要求高,教授疲于应付。这种考核方式,急于求成,劳民伤财,不符合教师成长规律,也违背学术发展规律。国外高校实行教授终生制、终身后评审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民国教授没有考核之说,而且还有学术休假制度,教授可以静心研究。学术有它的规律,不能预见、不能规划,失败是常态。因此,要延长教授的考核时间,放宽考核条件,对教授要有包容之心,允许教授有学术休整期,注重质量而非数量考核,通过完善教授评价制度,促进学术发展。

(三) 营造宽松环境

一是赋予宽松的学术环境。宽松的学术环境有利于教授免受不合理干预,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民国时期虽然战乱纷飞、物质贫乏、条件艰苦,但教授有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思想自由。教育部2019年工作要点中就提出“营造教师安心、静心从教的环境”,要减少评比与评估,让教授安心学术。学术是追求真理,在真理面前没有禁区,没有权威,更没有霸权,正如毛泽东所言:“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43]学问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要倡导学术民主。

二是营造尊重人才的氛围。21世纪的今天,人才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强化,因此,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保障。回望民国大学,虽然资源匮乏,但为教授提供了优厚的待遇,营造了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习总书记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需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我们迫切需要尊重学术、尊重教授,营造一种适合学术发展的土壤与环境,解决教授的后顾之忧,让他们以学术为荣,一心一意做学问;不拘一格选拔教授、培养教授、使用教

授,改善教授工作环境,生活上给予更多的帮助和照顾,为教授治学提供保障。

注释:

[1]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十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03页。

[3]胡适:《非留学篇》,《留美学生年报》第1卷第3期,1914年1月。

[4]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52页。

[5]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53页。

[6]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38页。

[7]张维:《熊庆来办学思想初探》,《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

[8]黄壮丽:《人文关怀理念与高校师资建设路径探索——兼谈马君武博士创办广西大学的师资建设经验及当代价值》,《中国成人教育》2013年第21期。

[9]闻曙明、高雨:《唐文治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兼论无锡国专教育管理模式》,《煤炭高等教育》2010年第4期。

[10]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9页。

[11]王悦芳、曹景国:《郭秉文“教育之关系生活”思想论析》,《教育与教学研究》2014年第10期。

[12]徐有富:《钱穆治学的若干特点》,《古典文献研究》2006年第00期。

[13]俞平伯:《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4页。

[14]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02页。

[15]编者:《〈时代公论〉是“铁面无私”吗?》,《时代公论》1932年第1卷第10号。

[16]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11-312页。

[17]冯友兰等:《那时的大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5年,第15页。

[18]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54页。

[19]顾毓琇:《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1期。

[20]《北大教授:讨论民国教育存在过度美化现象》,http://news.sohu.com/20131218/n392011640.shtml。

[21]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6)》,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57页。

[22]张意忠:《民国记忆——教授在当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前言”,第1页。

[23]何广棣:《从陈垣先生之一通函牍谈起——兼永怀方豪院士》,《传记文学》(台)1986年第3期。

[24][25]郭杨:《民国大先生》,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6年,第176、2页。

[26]薛其林:《实证方法与民国学术》,《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27]王兆良:《胡适的方法论刍议》,《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28]薛其林:《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29]郁振华:《逻辑分析法及其限度——清华学派的哲学方法论》,《学术月刊》1997年第11期。

[30]薛其林:《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民国学术》,《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31]钟敬文等:《谈治学》,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48页。

[32]薛其林:《直觉方法与民国学术》,《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33]张岱年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6页。

[34][36]王喜旺:《西南联大的学术精神》,《史志学刊》2017年第6期。

[35]闻黎明:《闻一多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4页。

[37]汪荣荣:《一代儒宗钱穆》,《传承》2009年第21期。

[38]何丽娜:《心曲没有终止符:非正常离世作家非常档案》,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63页。

[39]葛剑雄:《被高估的民国学术》,《决策探索》(下半月)2014年第10期。

[40]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文艺复兴》1946年第2期。

[41]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29页。

[42]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页。

[4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9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